



斯蒂格·达格曼

1923年，年轻采石工的女友来到男友父母家，一个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的一座小农庄待产。10月25日，一个男婴降生。由此，斯蒂格·达格曼（Stig Dagerman, 1923–1954）便开始了他短暂却极具创造力的一生。达格曼的生母很早就离开了，后来他曾这样描述生母的离开：“新年的一天……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出了他们的生活。雪卷走旧年。她再也回来。”男孩斯蒂格1927年初由生父抚养，改父姓雍松。1942年自行改姓达格曼。11岁时，斯蒂格被父亲接到斯德哥尔摩劳工聚居区。1940年9月，在他16岁时，乡下的祖父被疯子刺死，受惊的祖母10月离世。他曾回忆道：“听说刺杀事件的晚上，我跑到市立图书馆，试图为死去的老人写一首诗。可除了可怜的、因羞涩而让我撕了的几行字，什么也没冒出来……在虚弱和哀伤中，有一样东西产生了……那就是当作家的欲望；能去表达什么是哀悼、被爱过以及被孤独地抛下。后来，我继续写作，背后怀着同样的想法。”22岁，他以小说《蛇》登上文坛。

《蛇》（1945）参考了作家的兵役经历，表达了反战情绪。后来达格曼传记作者、评论家拉格尔斯克兰茨盛赞小说有非凡的出发速度和喷气式飞机的力量，“20世纪没有别的瑞典作家以如此震撼而令人信服的方式登上文坛”。达格曼1946年初开始专业写作，同年10月出版小说

《被判者之岛》。受卡夫卡、加缪等人的启发，他1947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游戏》。他1948年出版的小说《灼伤的孩子》关注纯净和罪疚，1949年改成戏剧《无人得救》。1949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婚礼的烦忧》让他重返祖父母的农庄。此外，达格曼1944年担任《工人报》文化编辑。他和德国人阿纳玛瑞早早就结婚，帮助岳父母一家定居瑞典。岳父母家是逃离纳粹的难民，在他们的帮助下，达格曼完成了对战争废墟中的德国的报道，1947年集成《德国之秋》一书，这本书让他名扬欧洲。

达格曼的创作主要分三个时期。“象征主义”时期以《蛇》《被判者之岛》为代表。《德国之秋》开启现实主义时期，如《夜晚的游戏》《灼伤的孩子》等。最后是看似现实主义却有显著象征主义元素的时期，如《婚礼的烦忧》。

#### 消失的引号与自由的叙述者

乡村八月，怀着前男友孩子的希尔多将与鳏夫韦斯特隆德成婚。小说《婚礼的烦忧》从婚礼这一天凌晨四点差一刻开始，次日凌晨结束。这期间，各种纷乱的事件此起彼伏。小说推出后，有人盛赞作家的才情，也有人质疑人物和事件太



## 斯蒂格·达格曼： “确认我的话语触动了世界的心”

□王晔

过繁杂，书写有失控之嫌。

1949年夏秋创作这部小说时，作家处于声名和截稿期（圣诞节推出）的压力之下。而更大的压力，还是表达的野心。小说并非慢慢打磨而成，不能说是完美，却很有深度和广度。小说中人物众多，有人物必有对话，从现在对话到个人独白，意识流及叙事中蔓生的过去的对话。一个显见特征是，除当下的直接对话，其他对话内容都不见引号。引号消失，意识流在人物间转换，外加相连句子里代表不同人物的“他”或“她”，阅读难度不小，须梳理出声音究竟由谁发出。而叙述者自

由出入人物意识，这手法开篇即有运用。

小说中，凌晨3点45分，有人敲新娘的窗。叙述者同时进出不同空间，也进入多个人物的意识。小说通过新娘希尔多，以及新娘母亲海尔玛，父亲维克多、姐姐伊尔玛等人在各自空间对敲窗声的反应来演绎。交错和叠加放大了这一刻。不单表现此刻，还以人物意识中的次生对话和冲突展示出人物的前史。新郎韦斯特隆德出场后，他的美国经历、和前妻的对话与冲突再现。如此，小说的时间从婚礼日往前回溯多年，空间也从闭塞乡村延至遥远的美国。

叙述者和角色的声音界限也显模糊。小说中的叙述多顺叙，也充满回忆，在过去和当下交错。过去的一幕鬼魅般对当下穷追不舍，加大了紧张感和冲击力。时隐时现的叙述者有时还以全知姿态透露无人知晓的信息。

#### 从“蜗牛壳”到“我们的房子”

维克多的原型之一是达格曼的祖父，从《一个孩童的回忆录》中可见，祖父和维克多一样，总疑心邻人要来抢他的农庄，八月里会咬一咬家人

递来的黑麦穗。“房子”这个源自生活的意象却被作家照射出强烈的象征意味。

蜗牛壳小而封闭，如伊尔玛的床头板几乎触到房梁，她“拼命想逃脱，最终还是回到这里”，济贫院里“休息着穷人的命”，流浪汉睡在仓库的草窝或路边泥沟，没有前方，一直走，会回到“出发的地方”。对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尽管他们的日常无战争，孤独和恐惧却是每个人的感受，窘迫的日常也带来恐惧。

1948年秋，作家坦言自己因孤独而写作，目的是为他人缓解孤独。一旦意识到“人皆孤独”，人就可能接触到同样孤独的他人。共情和宽恕或成为改变现状的工具。

1952年，作家感叹：“我可以用脑海中燃起的最美的词语填满所有白纸。因为我渴望确认我的生命不是毫无意义，也不是孤独地存在于这世上，我将这些词语汇成一本书，献给世界。作为回报，世界给了我金钱、名誉和沉默。可我在乎金钱吗？我在乎自己为文学进步做出了贡献吗？我唯一在乎的是我永远无法得到的：确认我的话语触动了世界的心。”

早在1942年，作家创作过短篇小说《秋日将至》。小说中，无名氏走进铁道工小屋。铁道工问，你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无名氏答：“我大概是从某处来的，我大概要往某处去。去哪儿，不知道。或者，我兴许知道。这是我的生活或者说我的命运……有一天，当所有的人都明白爱是唯一能给予我们活下去的力量的东西……那天起再没有谁想要去死。那一天，永恒的春天将会到来……”

显然在这则短篇里，作家已得出“爱是抵抗死亡的唯一可能”的结论。岁月更迭，他的表述更为清晰，1950年，在回答“我们是否还对人类抱有信心”的提问时，作家回答说：“我相信团结、同情与爱是人类最后的‘白衬衫’。在所有美德中，我最重视被称为宽恕的那种爱。”在他看来，团结关乎人类和自然。“世界你无法重塑，平息你狂躁的灵魂！你只能做一件事：善待他人。”

斯蒂格·达格曼小说中理解和宽恕的主题受到同时代瑞典小说家拉斯·阿林的影响。过往创作沉浸于焦虑、恐惧和黑暗的达格曼，意识到了穿过焦虑找到自由、透过黑暗看到光明的可能性。小说实践了达格曼的愿望，通过一座桥打破“我”的孤立。

#### “而对光的渴望永不熄灭”

小说《婚礼的烦忧》中对乡村自然的描写也展现出了作家的创作天赋，生活赠予他自然万物的细节与讯息：被冷落的情人眼中充满悲伤的“露水”，痛苦像“子弹”射入驼鹿体内，黑暗的词汇从“深井”中取出，而太阳“发射了一些求救信号”……独特的譬喻赋予叙事幻觉般的力量。

这出悲喜剧狂野而多彩。农民、屠夫、流浪汉等个个有缺陷和压抑，忽隐忽现的月光下有酒精、性爱、疯狂和灾难。时间从一天拉到永恒。空间从蜗牛房扩展到无边大地。以超现实主义透视现实，在激烈冲突后寻觅和解。作家对记忆和想象中的人物充满同情，借其命运和一场婚礼，探讨孤独、恐惧、爱、宽恕和救赎。有评论家说：“万物都痛苦、令人愤怒而卑微，但这一切看起来仍然宏伟、崇高和纯洁。”书写上世纪三四十代瑞典乡村的文本因为对存在的思考跨越了时空局限，它是达格曼最后一部小说，让我想起书中哑了的歌者的绝唱：

他手中的毛巾松弛下来，如一面旗帜，他闭上眼歌唱，歌声充满疯子安德斯的房间，旗帜在风中飘扬，它笔直地挺立在风暴里。此刻，在整个地球上都能听见他，刺猬们听见了他醒了过来，藻类因他的歌摇摆，他越过山脉，他是一股将沙漠抽打得血淋淋的飓风。他独站在黑夜下，一顶草帽抵着胸膛，那是最大的巨人草帽，他将用歌声把它填满……

斯特林堡写过乡村婚礼，马丁松写过流浪汉，达格曼的小说让人想起不止一个作家。但它绝非模仿和拼凑，因为达格曼有才华，也有始终如一的书写焦点：存在的孤独和恐惧，获得安慰、救赎和自由的可能。

1954年，达格曼31岁时自杀身亡。他以一系列作品深切关注世界的战争和人的内心，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欧洲作家之一。回顾他的一生，如同他所写的诗句：“而今一朵花儿绽放在寒夜。/而今一只火鸟飞向天空。/对这样的鸟来说，飞行短促。/光的花园迅速枯萎。/燃烧之物生命短暂。/很快，翅膀将在黑暗的屋上消失。/很快，玫瑰将在夜花园里凋零。/而对光的渴望永不熄灭。”

（作者系文学翻译家，本书译者）

#### 现 场

## 她们如何讲述？ ——文学叙事中的女性群像与共同体密码

□马倩男 孙佳琦

#### 世界文学中的女性

世界各国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将个人经验升华为群体记忆，在挑战殖民历史叙事与父权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形成跨越文化差异、兼具抗争性与包容性的女性精神共同体。山东大学教授李保杰聚焦海外华人文学中的“金山叙事”，剖析留守女性作为“文化守成者”的独特作用。她们通过维护家庭伦理与传承传统文化，建构了一种隐性的另类英雄形象——“金山婆”以留守姿态支撑家庭物质基础、守护文化基因，在男性移民的财富叙事之外进行补充性文化抵抗。该研究不仅解构了移民共同体构建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也使女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重角色得到彰显：既为家庭核心支柱，亦是跨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勿忘塔兰泰拉》是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东南大学教授柯英认为，穆尔海德通过蛛网式叙事结构与多声部叙述，展现了女性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小说以塔兰泰拉舞为核心意象，连接不同地域与背景的女性，使舞蹈与写作成为女性集体记忆与精神觉醒的载体。女性通过交流与书写实现自我认同，塑造开放且富有生命力的共同体，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叙事模式及研究视角的启迪。

通过对比分析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跨世纪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车琳指出，法国文学中女性共同体的建构，是以解构父权话语体系与批判性历史叙事为双轴，将女性从“他者”转化为知识生产主体。这一共同体意识，既超越了两性对立，又彰显了法国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平等的持续追求。当代女性共同体需在历史经验谱系与技术资本主义现实之间，构建能应对流动性、后人类困境的新型伦理联结框架。

#### 跨媒介视域下的女性叙事

在传统的文学形式之外，跨媒介叙事通过多模态文本实践，重构了女性共同体的生成机制：期刊的物质性传播网络与剧本的表演性话语体系，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单向度叙事模式，形成媒介间性框架下的互文系统。这种互文性不仅实现了女性记忆档案从私人书写到公共领域的空间转换，更通过不同媒介的协作，在印刷文化、舞台艺术与数字平台的交叉界面中，建构起具有时空穿透力的集体身份认同范式。复旦大学教授Sandro Jung以19世纪英国地方刊物Ladies Memorandum Book为中心，探讨其作为女性诗歌发表平台如何促成区域性写作共同体的形成。他认为，女性作者通过诗歌创作确立区域与性别双重身份认同，并运用性别化修辞策略发展独特的文学生产机制。这不仅揭示了该共同体在刊物内部互动与地方出版网络拓展中的运作逻辑，丰富了19世纪女性文学传播研究，也为文学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新的出版文化视角。

小说的戏剧性已成为跨媒介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揭示小说与戏剧之间的媒介交互关系，亦可深化对叙事方式与女性文学共同体表达的理解。北京大学副教授修立梅聚焦小说与戏剧的跨媒介互动，探讨“剧场小说”在艾丽丝·默多克作品《词语孩子》中的呈现。在她看来，默剧的表演性体现了默多克对语言、现实以及自我塑造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女性作家借助跨媒介叙事突破传统边界，构建兼具个体经验与集体共鸣的文化身份，并拓展了女性叙事的方法论。

#### 多元化与异质性

女性群体在跨越种族、阶级、地域等边界的对话中，通过承认多重身份的交叠与冲突，在差异协

#### 文学叙事与女性共同体构建

叙事传统与女性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联系深邃而紧密。叙事不仅是一种个体表达的方式，更是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学叙事，女性得以书写自身历史、编织情感纽带，进而构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清华大学教授曹莉以山鲁佐德这一经典女性形象为切入点，深

商的动态过程中，构建起既保持个体异质特质、又具备集体行动张力的共同体架构。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峰通过分析《你们这些还魂尸》中的时间循环与性别转换，解构了传统性别观念与共同体归属的固有关系。他认为，小说打破了生育与女性身份的关联，消解了生理性别对共同体的限制，并通过流动的性别身份挑战社会规范。在对性别角色“表演性建构”的探讨中，揭示了女性共同体边界在去本质化语境下的重构，是一种基于动态身份协商、而非固定生理属性或社会分工的共同体。

通过对奥斯丁小说中“闲言碎语”的解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何畅揭示了这一性别化话语实践的矛盾特质：它既是父权制度下的话语规训产物，又成为女性在私人领域建构替代性公共空间的特殊策略。这些日常言辞既折射出前现代社会中女性公共参与的边缘化处境，也暗含她们通过符号化语言争夺话语权的努力。这一研究为理解女性如何在压抑语境中通过微观话语实践实现自我赋权提供了理论视角，修正了传统公共领域理论对女性经验的遮蔽。

在对《不存在的女孩》的解读中，郑州大学教师袁杰指出，该作品以禅宗“不二”思想为核心，试图建立一种去中心化的生态哲学——既非人类凌驾万物，亦无种族或存在者之间的等级差异，在挑战西方进步史观和主客二元论的同时，指向一种万物共生、时空交织的新型共同体哲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莉在梳理我国外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时，阐释了“女性与共同体”议题的学术生长点及其现实关切，强调女性创作主体、性别叙事范式和研究者主体性三重维度对当代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启示。郑州大学教授高晓玲指出，“共同体”概念历经古希腊的共善实践、威尼斯的有机共同体理论到鲍曼的情感联结观，始终围绕共同理解与情感纽带展开。在此背景下，外国文学研究应捕捉女性在文本内外重构共同体伦理的实践轨迹，重视女性文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中的作用。

在当代语境下，女性与共同体的关系呈现为一场解构与重构的双向运动——既打破以同质化为内核的传统共同体想象，也拒绝将差异固化为新的本质主义牢笼。通过文学书写、身份协商和跨文化对话，女性群体以流动的异质性重构共同体范式：它既非虚幻的普遍性承诺，也非碎片化的个体独白，而是在承认创伤裂痕和权力褶皱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话语生产与行动网络，在父权制与殖民性的裂隙中培育出具有伦理温度和变革潜能的共生之网。

（作者系郑州大学青年教师）